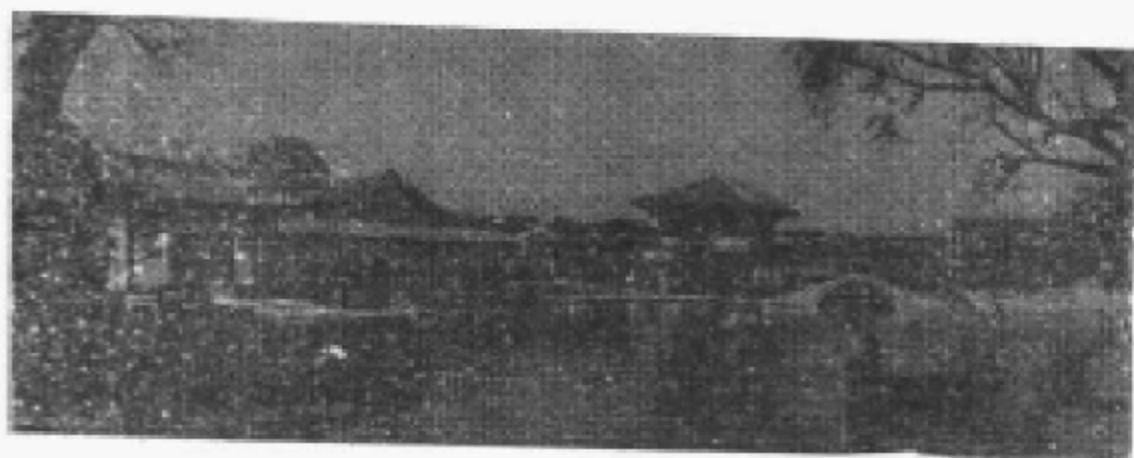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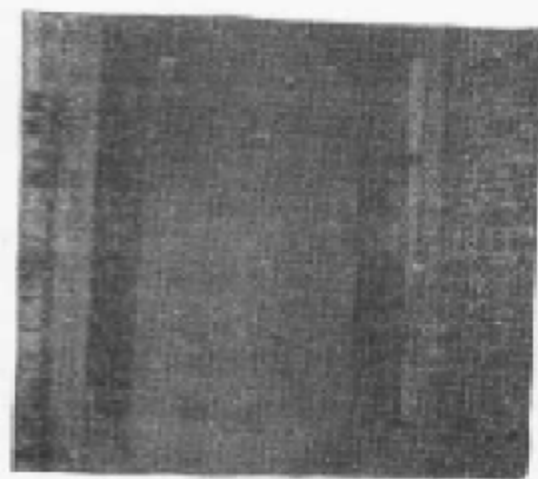
广汉房湖公园的
琯國內的房琯像
(唐代)



广汉房湖公园内的房
公石 (唐代)



广汉房湖公园园风光



圣谕碑（明末）



圣谕碑亭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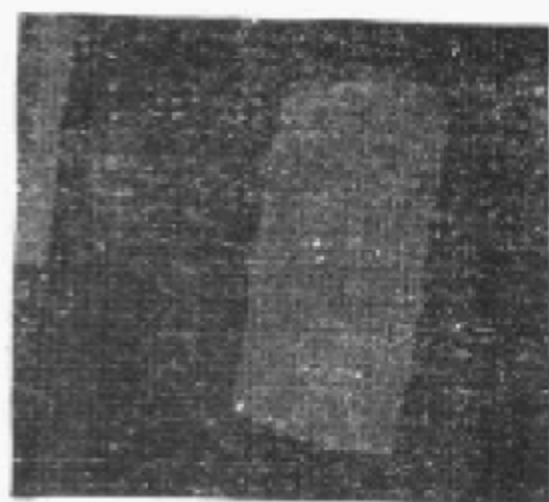
摇钱树
(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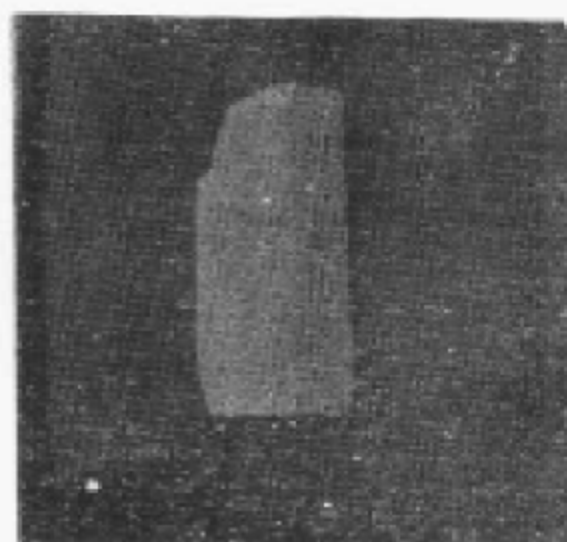
聚宝瓶 (汉代)



金仙桥全貌



城砖



官城砖

目 录

◀星星之火▶

- 我在广汉时期的一段革命经历……………礼广贵 (1)
一次反法西斯教育的学潮……………任作普 蒋春信 (11)

◀人物春秋▶

房 瑄

- 兼述杜甫与房瑄患难深情…杨永峰 隍 熙 (17)
安晋彦烈士传略……………江达川搜集整理 (22)

◀抗日后方▶

- 广汉壮丁围城事件始末……………向启杰 (26)
在“围城”的日子里……………荻 青 (32)

◀革命历程▶

- 送粮黑水支援前线……………江达川 (37)

◀文史争鸣▶

- 一桩争论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公案……………陈道君 (40)
张献忠的“圣谕碑”……………向启杰 (57)
“圣谕碑”与“万人坟”
——汉州历史文物考辨……………曾广泽 (61)
读《我看张献忠的“圣谕碑”》之后……………江德清 (69)

◀五业瞻顾▶

- 广汉渔业今昔……………何雅宣 (77)

历史轶迹

——1909年至1981年广汉农业方面的

报道标题摘录……………何雅宜 (83)

◀文物古迹▶

摇钱树和聚宝瓶……………敖天照 (114)

出土篇……………荻 青 (116)

“雒城砖”发现记……………刘继尧 (118)

金雁桥杂忆……………刘一良 (121)

◀旧闻杂忆▶

旧社会学徒生活一瞥……………张继滨 (123)

漫话雒城茶馆……………代小江 (128)

◀雒城之窗▶

资料小统计

一、广汉县二百六十年来人口统计

二、广汉县参加抗日战争的壮丁人数统计

……………何雅宜辑 (136)

◀补正·释疑▶

孔子像不是铁铸的…………… (139)

◀插图之页▶

房琯塑像

房公石

琯园风光

张献忠的“圣谕碑”

金雁桥全貌

摇钱树

聚宝瓶

雒城砖

雒官城堞

我在广汉时期的一段革命经历

礼广贵

我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北平（今北京），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初中读书。由于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和阅读一些进步的书报杂志，使我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从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开始，我随中山中学西迁。迁移途中，在中共外围组织“民先”领导下，组织一个宣传队，沿途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但受到学校反动当局的迫害，宣传队领导人被开除，并计划对参加宣传队的同学全部开除。于是我和宣传队的二十多个进步同学组织一个秘密组织“动社”，以对付反动当局的迫害。

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山中学迁到四川自流井。此时，由“动社”为核心领导，发动驱逐校长韩清纶（CC分子）的“学潮”。在“学潮”中，得到自贡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声援与帮助，从而认识了自贡学生会代表谢道炉（现名谢韬，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此后，直到一九四四年，我与谢韬经常保持联系。

一九四二年春，我在成都“未名书铺”（经理是中共地下党员时有恒）作店员，谢韬也正在成都金陵大学读书，我

们经常见面。记得谢韬曾向我传达过周恩来同志对国统区工作的“三勤”指示，即勤学习革命理论；勤交友，联系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勤业务，搞好本职业务工作。还有一次，谢韬向我传达中共南方局青委的指示，要在国统区广泛展开群众工作，每个同志都要学会独立作战。根据这些指示精神，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谢韬提出要我和其他几个进步朋友都要注意隐蔽。可以到外县去，到农村去，开展宣传工作，传送党报和地下革命刊物，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即离开成都，到了广汉县。

在广汉，我一直工作到一九四六年初，共三年零八个月。这期间，我从中共地下党同志处，经常可以得到许多具体指示。除谢韬外，还有苏西林（现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和倪子明（现在国家出版社工作）。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我在广汉的工作都十分关心，给予很多有力的支持。谢韬当时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一般情况下，我和谢韬一个月可以见面一次，有时谢也到广汉来。会面时，我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他提出具体意见。我们还交换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及应注意事项等。一九四三年，经虞丙默介绍，我认识苏西林同志（中共党员），他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工作。一九四四年初，经谢韬介绍，认识倪子明同志，他是中共西南局“青委”由重庆派到成都来的，是由“青委”负责人刘光直接领导的青年小组成员，社会职业是成都联营书店经理。我在广汉后期，即四四年、四五年因谢韬去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就主要由苏西林、倪子明同志对我进行领导。

在广汉三年零八个月时期中，我先后在川康直接税局广

汉分局工作三个月，在广汉中学教书一年，因思想“左”倾被校长解聘。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去广汉力生中学教书二年半，后因国民党广汉县党部及三青团计划对我下毒手，我即于一九四六年初离开广汉，结束教书工作，回到成都。在广汉这段时间，正是抗日战争后半期，根据谢韬和中共成都地下党员苏西林、倪子明同志的指示，我主要从事下述几个方面的工作：

为了加强在广汉的宣传组织工作，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将中山中学同学、“动社”社员李馥春由成都接来广汉，一面养病，一面和我一起进行工作。李馥春在中山中学的同班同学李刚，原准备去西北军事学校学习，经我们劝说，他决心脱离军界，和我们一起干。经我介绍暂到广汉税局做事，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又介绍他到广汉中学任高中军事教官，以此为掩护，和我们共同开展学生工作。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刘宁从三台东北大学、陈震从成都齐鲁大学先后来到广汉直税局工作一段时间。她两都是中山中学“动社”社员。这些同志集中到广汉来，无疑使我们开展工作的力量加强了。

课堂内外讲时事，是我向学生进行启蒙教育、渗透革命思想的重要方式。从“九·一八”事变，直到当时的中外大事，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抗战后大片国土变成沦陷区，控诉敌伪在满洲国及沦陷区的残暴统治罪行；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发展情况；分析国际国内当前的政治形势等等。讲得事实生动，观点清楚，使学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关心国事，提高了觉悟。同时还使他们懂得必须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内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懂得中国共生党、八路军、新四军是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搞分裂倒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很不得人心的。由于我不太隐瞒这些政治观点，所以一些有正义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进步学生逐渐向我靠近，这就为我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广汉中学，经过半年多的启蒙教育和思想发动，有十几个同学已团结在我的周围，对我的政治倾向已很清楚。学生刘继尧将他的舅舅曾天金、曾天银和林伯渊、龚思雪、吴江月、李升辅等金堂县的进步青年朋友介绍给我。林伯渊又介绍在广汉县经收处任会计的张孝先给我，经过张孝先介绍，又认识德阳县的一些青年朋友。后来，又通过缪培源认识了他的叔叔缪恒苏等几个青年诗人。这些人都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对共产党有好感，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同情被压迫的工农大众疾苦。由于有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很快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一九四三年下期，依靠这些朋友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工作地区已从广汉扩展到德阳、绵竹、金堂、淮州、赵镇等几个县镇，工作对象从中学学生扩展到社会青年中去。整个工作局面已初步展开了。

在广汉中学和力生中学，经过两年来的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前后，已有二十多名同学积极靠拢我和李馥春。他们阅读进步书报杂志，学习新的知识和革命道理，要求进步十分迫切，思想觉悟提高较快。当中有些同学已经开始承担一部份工作，而且干得很不错。一支进步的学生和青年队伍已初步形成，这个情景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这里还应介绍一下力生中学校长陈守清。他知道我因思想“左”倾而被广中校长解聘的，他却敢于聘请我到力生中

学任教，而且是先说定一聘就是五年，并要我担任级任教师（即现在的班主任）。他对我在课堂内外的言行也是清楚的。一九四四年暑期，他偶然发现我在秘密看《新华日报》，也没回避，而且以后公然经常大模大样地从我处借《新华日报》看。特别是在后一年半中，对我在校外、在附近几个县镇上的各项活动也明知不问。以后才知道他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共产党的。我在广汉力生中学的二年半中，各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得到了陈守清的暗中关注和掩护。一九四五年末，如果不是陈守清及时告诉我国民党广汉县党部及三青团要对我下手，我是不可能很快就离开广汉的。

启发学生订阅进步报纸杂志，培养学生阅读报刊杂志、关心时事的好习惯。经过一些动员工作，学生订阅了成都的《华西日报》、《华西晚报》，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等，最多时达一、二百份，订阅进步杂志的更多一些。对一部份思想日趋进步、倾向共产党的同学，则让他们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有一个时期，张人杰家成了《新华日报》、《华西晚报》的发行站。实践证明组织学生订阅报纸杂志，是开展宣传工作，进行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办法。

发动学生成立图书室、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思想性、科学性强的课外读物。学校图书馆的书很少，在两个中学，我都组织学生自己凑钱买书，成立图书室，自己管理。如三联书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新书，鲁迅著作、苏联作家的文艺作品，各国童话、科学小品等都可以从图书室借到，《大众哲学》、《社会发展简史》等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读物，也可以借到。通过阅读和组织讨论，对扩大学生知识

面，培养高尚情操和集体主义思想，抵制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都有好处。同时还可以锻炼学生为大家服务、管理图书室的办事能力。一般的读书讨论会在学校举行，有些重要的书籍、文件、材料的学习讨论，则在张人杰家秘密举行。

出壁报。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刚组织广汉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出刊《大旗》壁报，借以培养学生阅读及写作兴趣，进而学习社会科学，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走向革命。我组织学生出刊《剪辑》壁报，把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进步评论、文艺小品、杂感漫画等剪辑在一起，颇受学生欢迎。在力生中学，我组织学生出刊《春雷》壁报。李馥香、李刚和我编辑了两种内部手抄刊物《灯塔》、《驼铃》，先后共出三期，在进步朋友中传阅，内容主要是揭露黑暗、憧憬光明的文章。在我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力生中学周彻之、丁起逵、张阔之等同学组织出版《白梅》小刊物（石印的），后改为《野草社》，还出刊过几期手抄刊物。邓浚昌（邓伯海）、张开吉等同学还组织过“美术研究会”。经过这些活动的锻炼，一部份同学先后在《华西晚报》、《华西日报》、《民众时报》、《联合画报》、《活路》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反映现实斗争的文章。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独山失守，蒋介石正准备从重庆再次迁都的时候，川西各县虽离前线尚远，但也人心惶惶。这时我和几个同学编辑一期《战斗》壁报在广汉大街上贴出，提出不能再逃跑，要就地进行战斗，号召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如果日本侵略者一旦打到四川，我们就执干戈以卫社稷，战斗到

底。这期《战斗》壁报曾引起广汉各界人士的普遍注意。

一九四四年，我经常可以从成都中共地下党员苏西林、林友民（当时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工作）处得到党的文件及宣传资料。如《评中国之命运》、《乡村调查大纲》、《老百姓》（地下油印刊物），《新官场现形记》等。一九四五年五月，党的“七大”结束不久，在《新华日报》尚未全文发表前，我即从苏西林处得到《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重要文件。苏军对日宣战，朱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的进军命令，我也从林友民处得到。这些文件带回广汉，立即组织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传阅、讨论。有时文件不够传阅，就用手转抄，如《评中国之命运》就由彭代述亲手抄了一本，这些同志真正扎扎实实地在干工作。通过学习讨论，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进一步明确政治方向，对加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和农村工作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朋友，如苏西林、林友民、谭久平、邹荻帆、汪骏、安亚奇等，他们的工作就是搞图片展览。图片内容主要是介绍反法西斯战斗的胜利发展情况，抗议法西斯暴行，反映解放区战场及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等等。搞图片展览实际上就是宣传和平、民主、进步的历史洪流不可抗拒，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必然覆灭。我经常从图片部借图片拿回力生中学展出。一九四四年冬，苏西林、汪骏等同志决定要我在广汉安排一次大型图片展览，以吸收广大观众参观。我组织学生在广汉城乡展出，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力生中学训育主任黄祖烈是广汉县三青团的区队长，又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监察委员。他看到三班学生和我接近的较

多，思想逐渐“左”倾，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即强迫三班学生全体加入三青团。几个经常和我接近的学生及时反映了这个紧急情况，我们研究决定，坚决予以抵制，发动全班同学到时候都不填登记表，不参加宣誓会，经过个别串连，全班基本上采取一致行动，粉碎了在三班发展三青团的计划。黄祖烈气急败坏，明知我在从中作梗，但也无可奈何，乃个别通知为首的学生勒令退学，其余几个也受到严厉申斥。

中共代表团一直把释放张学良将军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九四五年八月，为了大造舆论，我参与了发起“成都市大中学校东北学生呼吁释放张学良将军”的活动。由我起草的呼吁书，经黎澍同志修改后，在《华西晚报》头版头条刊出，震动很大。重庆、昆明等地的东北学生都予以响应，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使蒋介石背信弃义的面孔再次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一九四五年冬，昆明学生“一二·一”运动发生了。我在力生中学出刊《剪编》壁报，即通过有关报纸的剪贴，详细介绍“一二·一”学生运动暴发的原因及四烈士殉难的经过，昆明学生的合理要求，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装镇压等情况。引起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慨，无不对国民党的暴行切齿痛恨。我因势利导，动员师生募捐、写信慰问昆明学生及死难烈士家属。这项活动引起了广汉国民党及三青团的极大注意，竟成为他们要对我下手的直接原因。

彭代述、张人杰、刘继尧等同学，由于我和李馥春、李刚对他们的思想影响，由于通过阅读革命的进步的书刊而提高了觉悟，他们几个从一九四四年起，周彻之从一九四五年起，都相继辍学，走向社会，直接在我们的领导下，力所能

及的做些拓荒者的工作。彭、刘到松林，张人杰到新丰。他们都按党的指示，到农村学校和青年中做启蒙教育及思想发动工作。周彻之等则到外县镇筹备书店。一九四四年冬，李毓春也到松林乡小学去协助他们学习和开展工作。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谭允平（地下党员）在成都对我说，中原军区急需要人，要我动员进步青年前去。经过一番发动，乃介绍缪恒苏、陈道钊等通过谭允平的安排去重庆《新华日报》，再取道贵州去湖北宣化店中原军区工作。成都二二五童子军图书社的游惠海也是经我介绍去中原军区的。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我和李毓春、张孝先、周彻之等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在前两年开拓的工作基础上走出学校，面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去开展工作。通过办书店，把大量进步的革命书籍、刊物、报纸推销到社会各阶层广大群众中去，满足读者需要，对进行思想启蒙，开展革命活动很有作用。尤其在外县镇开办书店，对开拓进步文化阵地，配合民主运动的发展，尤为当时所急需。我到成都把这个想法向倪子明、苏西林同志汇报，他们认为这个方向完全正确，各县镇有了进步书店，就更便于把党报党刊经常地发行到基层去。倪子明表示要经常给以指导，并具体给予支持。他说联营书店可以赊帐发货，出售后再付款，滞销书可以退货。于是我和张孝先、刘家农、卢尔庄、周彻之等同志一面筹备开书店的事，一面我还得在力生中学照样教书。当时我们商定这样几条开办书店的原则：一、先从外县镇开办；二、由当地筹集资金；三、在当地选择进步的朋友负责筹办，以便将来主持店务事宜，担任经理职务；四、经营方

向应以经售及发行进步书籍杂志报纸为主，但也不要搞得太红，比如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也可夹杂其间，但不能太多，否则就失去开书店的意义。到一九四五年下半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倪子明同志的直接领导和联营书店的积极支持下，在各地朋友的大力援助下，我们先后在四个县城、三个镇办起了七处书店，担负起发行党报党刊、推销进步书刊的任务。

由于我在广汉两个中学里的活动和四处奔走创办书店，引起了广汉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的严密注视。到一九四五年底准备对我下毒手（陈守清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另外，外县镇书店开得这么多，在成都急需要一个总经售处，于是我和张孝先、周彻之等同志商量，决定我立即离开广汉，回成都创办“西川书局”，担负起外县镇七处书店的“总管理处”和总经售的任务。为此，我于一九四六年初离开广汉。

注：礼广贵系中共党员，原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已离休。

缪培元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一次反法西斯教育的学潮

礼广贵老师来广汉在力生中学任教时，是我班的级任老师。他一上课，就与其他老师不同。如上地理课，总是结合当前形势，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河山，培养学生爱国抗日精神。平时爱同学生接触，解答同学们提出的有关抗日救国的问題，并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和报刊给我们看。因为我在班上负责时间长些，他把《新华日报》给我们看，引导我们把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的情况比较，使我们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一九四六年初，礼广贵老师离开广汉时，我们不忍离开他。他要我们务必发奋，为民族争光，不要为恶势力所影响，不要被法西斯教育影响。要团结好学生中上进的青年，在必要时敢于斗争，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后来礼老师来信告诉我们，他在成都西川书局工作，我们有什么疑难问题也曾写信请他解答。

我们六班已是毕业班，是学校的老大哥，地位最高的班次。七班是明年的毕业班，也是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班。有一个姓黄的学生是什邡县某大爷的么娃，通过黄祖烈的关系，未经考试就进入学校的。他经常仗黄祖烈之势，在学校横行霸道。大约在1946年春，这个已为不少师生所厌恶的黄××耍流氓手段欺负女二班的一个同学，激起了全校绝大多数师生的义愤。我约到了我们班上篮球迷张大康、世曙、